



刘力奇

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中国的胜利



D60

12

刘 少 奇

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中国的胜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为“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杂志而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GDA30103

刘 少 奇

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 · 字数 17,000

1959 年 9 月第 1 版

195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500,000 定价 (三) 0.10 元

统一書号 1001·455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十周年了。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伟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始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以苏联为主力军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欧亚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都表明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没落是不可抵抗的历史规律。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革命把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线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使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制度遭到致命的打击。新中国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结成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在欧亚两洲连成一片、团结友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对于一切曾经遭受过或者正在遭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落后国家的人民，中国革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感觉到，中国人能够做到的，他们也应当能够做到。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力量对比，已经有了新的变化。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彻底的解放，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一日千里地、突飞猛

进地向前发展，从而迅速地改变着中国贫穷和落后的面貌。

中国在全国解放后的最初三年間，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顺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經济的任务，使工农业生产一般地达到了和超过了旧中国的最高水平。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国人民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計划，使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使現代工业在国民經济中的比重，从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四十。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完成，为中国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一九五八年起，我們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計划。一九五八年出現了国民經济的大跃进。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今年又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繼續跃进。同一九五八年相比較，今年工农业总产值，計划增长百分之二十，工业总产值計划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农业总产值計划增长百分之十。鋼、煤、冶金設備、发电設備、金屬切削机床、棉紗、原木、粮食、棉花等項工农业主要产品的計划产量，都将完成、超过或者接近第二个五年計划原定在一九六二年完成的指标。中国社会生产力这样飞速的发展，是任何資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当然更不是在旧中国的条件下所能梦想的。

馬克思說得完全正确：“革命是历史的火車头”。在中国，沒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民主

革命，沒有廢除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革命，就不會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迅速發展，就不會有象今天這樣全國人民精神煥發、意氣昂揚地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局面。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的希望和異常光輝燦爛的前途。

中國人民十年來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的總路線、社會主義革命的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的勝利。

在中國的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反復地闡明了這樣的思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只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繫，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一〕一方面，中國革命中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正象俄國的孟什維克一樣，他們用一道“萬里長城”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隔開，看不到這兩個革命之間的相互聯繫，在民主革命中看不到有把這個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的前途。另一方面，“左”傾機會主義者又類似俄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們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要在民主革命階段內消滅資產階級，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這兩種錯誤傾向，都曾導致中國革命受到很大的損失。同“左”右兩種機會主義相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指導中國革命的正確方針是：一方面，實行馬

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論，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的革命任务明确地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实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把这两个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尽一切可能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以便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不停頓地立即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紧紧地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由民主革命胜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任何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都提不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綱領，都不可能把中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就是我們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总路綫。这条总路綫，按照毛澤东同志的概括，叫做“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二）。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大国，它的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貧农和雇农又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农民問題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旧中国的反动統治是极端野蛮的，人民群众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进步的革命家大批地受到逮捕和杀戮。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深入农村，领导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斗争，达二十二年之久。党采取了坚决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发动农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

地、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线的方针(党的这个方针一直继续贯彻执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土地改革中),而不是采取与此相反的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资产阶级的方针,就使党在农村中建立了强大的可靠的革命堡垒,建立了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把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纪律性逐步提高到接近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水平,并且从他们中间取得了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所需要的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后备。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革命战争,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土地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实际上是为准备全国胜利而进行的长期反复的伟大的演习。在这些演习中,教育了群众,锻炼了军队,积蓄了革命力量,培养了干部,并且使党的领导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经验。

因为在民主革命中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盟,我们就能够正确地解决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正确地区别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封建主义的保护者和同盟者,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凶恶的敌人,必须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排挤,要求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因此,他们有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的可能。但是,他们有软弱性,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经常处于动摇的中间地位。这就要求我们,一

方面，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联合他們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革命；另一方面，又要同他們的妥协性进行斗争。实行了这样的統一战綫政策，我們就达到了壮大革命势力、爭取中間势力、孤立反动势力的目的，巩固地保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团結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割断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的联系的机会主义者和混淆这两个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都不懂得农民問題对我們的革命事业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而也不能正确地处理资产阶级的問題。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的路綫，把民主革命看成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事情。他們不去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主要地依靠同资产阶级的統一战綫；并且对于资产阶级只进行联合，而不进行必要的斗争。这样，他們就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情况下，就使革命遭到失敗，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挫折。就是在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經成熟，需要抓住时机，进行决定勝負的斗争的时刻，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也不敢爭取胜利，甚至要阻止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联合各种小资产阶级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并且錯誤地把中間力量作为主要的打击方向，否認在民主革命中有联合或者中立各种中間力量的必要和可能。他們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进行斗争，不进行适当的联合，更不愿意利用敌人的具体矛盾，集中力量去反对最主要的敌人。結果也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

权，使无产阶级陷于孤军作战，使革命不可能得到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忽视农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毅力，在反动统治时期，不承认我们能够 在农村站得住脚，能够 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能够经过农村包围城市并在最后达到夺取城市的目的。所以，“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调换位置。例如王明同志，他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人，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同“左”、右两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了全党，从而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使一个革命胜利接着一个革命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彻底地粉碎了旧中国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粉碎了它的压迫人民的官僚机构和军阀机构，从而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了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这就顺利地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革命的最主要问题即政权问题上，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巩固地建立了自己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因而就不需要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由于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一

分鐘也沒有忘記我們的最后目的是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因而在民主革命的長期鬥爭中就十分注意地確立了並且鞏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結果。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指出，在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以後，國外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而國內的主要矛盾則將由中國人民同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讓位給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並且提出了解決這個矛盾的一系列的基本政策。中國人民在全國勝利后的最初幾年，雖然還必須繼續解決民主革命階段遺留下來的任務，主要是在全國很大地區進行土地改革來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任務，但是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實際上已經在一九四九年開始了。中國無產階級依靠廣大群眾的支持，通過國家的力量，沒收官僚資本，牢牢地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積極地建立了強大的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並且使這種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居于領導地位。

在一九五二年年底，當恢復國民經濟和肅清封建殘余的任務基本完成的時候，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同時並舉的總路線，規定了在全國範圍內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在提出

这条总路綫的时候，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我們一方面同企图扼杀新中国的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团结了全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另一方面，在国内，一步不停地繼續进行着社会改造和建設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这条总路綫，是引导中国社会由当时的既有社会主义經濟、又有資本主义經濟、又有个体經濟的复杂的經濟結構，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經濟結構的路綫。当时，有些人否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他們或者企图在中国发展資本主义，走資本主义的老路；或者企图把革命停止下来，长期保持既有社会主义經濟、又有資本主义經濟的現狀。党的这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綫肯定是由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否定了从右的方面来的各种錯誤观点。同时，党的这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綫又肯定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須是逐步的，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必須是逐步的，从而否定了企图在一个早上就把資本主义消灭得干干净净的“左”的錯誤观点。

我們在农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点的步骤。

我們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三个互相銜接的步骤。第一步，在土地改革以后，紧接着广泛地发展了在个体經濟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互助組織。这种互助組

織帶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質，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已經出現了。第二步，在这种互助运动的基础上，紧接着又发展了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主要的生产資料还是私有的，这种合作社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質，我們把它叫做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就是实行土地和主要生产資料的集体化，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質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是我們所說的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农业合作化問題上，我們党内曾經有过不同观点的爭論。

有一种观点，認為我們工业化水平还很低，还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因此，要很快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这种观点已經被事实駁倒了。我們在基本上沒有机械化的条件下，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的任务。

有一种观点，認為迅速实现合作化，势必降低农业生产。这种观点也被事实駁倒了。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和合作化以后，我国的农业生产不但沒有降低，反而不断上升，并且上升得相当地快。

还有一种观点，認為我們这样迅速地实现农业合作化，会妨碍农民的团結，就是說，除了富农以外，富裕中农也会不滿甚至反对我們，而支持我們的将只有比較貧苦的农民。这种观点也被事实駁倒了。由于我們对富裕中农采取团結的政策，对富裕中农入社的大农具和牲畜采

取逐年偿还代价的政策，由于合作社生产的逐年上升，絕大多數富裕中农对合作化是基本上滿意的。

总之，事实証明，我們紧接着土地改革之后“趁热打鐵”，不停頓地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进行农业合作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好政策。如果我們在土地改革以后把革命停頓下来，讓农村資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发展起来，听任农民向两极分化，那在以后要实行合作化，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就会困难得多。

我們对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怎样实现的呢？主要是对資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資本主义的各种形式而达到社会主义国有化的目的。一般說来，国家資本主义的初級形式，是对私人資本主义工业实行供給原料、加工訂貨和統購包銷，对私人資本主义商业采取讓它們經銷代銷的办法；国家資本主义的高級形式，是对私人資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由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一定年限內給資本家一定的年息。

在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問題上，我們党内也发生过一些不同观点的爭論。

有一种观点，認為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只应当加以利用，而不应当加以限制和改造，或者說我們限制得过多、改造得太急了。这实际上是企图讓資本主义制度长期保持下去。資本主义的剝削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在同一个社会中，不是这个战胜那个，就是那个战胜这个，长

期并存是不可能的。

有一种观点，認為我們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又是逐步改造，又是实行贖买，又給資產階級选举权，又給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以一定的政治地位，“太妥協了”。他們認為，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我們还同民族資產階級保持統一戰綫，是原則上不許可的。他們要求用对待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那样的政策去对待民族資產階級，即沒收民族資產階級的财产，或者从国民經济中对資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簡單的、迅速挤垮的政策，并且剝夺資本家的选举权。这些人忘記了，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无产階級对資產階級采取贖买政策，是对无产階級有利的，这是馬克思和列宁多次說过的。至于无产階級专政并不一定要剝夺資產階級的选举权的問題，列宁在“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中也講过：“限制选举权的問題是某一国家中实行专政的特殊問題，而不是专政的一般問題。”〔三〕

我們对于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不是采取了“階級調和”的政策呢？当然不是。这种怀疑是完全不懂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誤解或曲解。实际上，我們为解决这个矛盾而采取的对民族資產階級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无产階級的极其坚定的階級政策，同“階級調和”政策沒有絲毫相同之处。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完全証明了这一点。

总之，我們对資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减少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并且在逐步改造的过

程中有条件地利用了資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設的进行，而結果是我們能够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彻底地消灭資本主义，并且要把資產階級分子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当然也是完全适合中国条件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好政策。

我們对农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并不象有些人所說的，拖长了改造的时间。相反，改造进行得很快。到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我們已經实现了农业的高級合作化，而紧跟着在一九五六年，就实现了資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与此同时，也实现了手工业的合作化。这就是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到七年的时间內，我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誰战胜誰”的問題。我們在解决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几乎完全沒有引起什么破坏，工农业生产一直是上升的。

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結束了呢？有人認為是結束了，再不需要进行任何革命了。我們認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結束，还必须繼續进行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現在，我国的資本家还拿定息，在經濟上作为两个階級的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失。即使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作为一个階級完全消灭以后，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資產階級的政

治影响，资产階級和小资产階級的习惯势力，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而同社会主义制度相抵触。特别是资产階級右派，还会利用这些情况，伺机向社会主义举行进攻，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有时他們的进攻还会达到非常猖狂的程度。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决不能局限于經濟战綫上，还必須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这个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争，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無論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馬克思主义仍然必須在斗争中发展。”〔四〕

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之間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斗争象波浪的起伏一样，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有时候表現尖銳，有时候比較緩和。这种斗争，要到资产階級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才会熄灭。

为了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澤东同志提出了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对待和处理这两类矛盾，并且提